

知遇：《西学东渐记》中的容闳与曾国藩

方华玲

(南京政治学院军史系 南京 210003)

摘要 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容闳在近代中国洋务史和教育史领域,发挥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这一切均得益于晚清重臣曾国藩对他的提拔与任用。以对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的考察为基础,系统解读曾国藩对容氏的知遇之恩,以期丰富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人脉关系研究。

关键词 容闳 曾国藩 西学东渐记 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6-06-2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ng Hong and Zeng Guofan Embodied in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Fang Hualing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Political Institute of PLA,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Yung Wing),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 graduating from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westernization history and the education history, which benefited much from Zeng Guofan who gave him big promotion and appointment. Based on Rong Hong's autobiography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the paper illustrates systemat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hope that the study on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process can be furthered.

Keyword Rong Hong; Zeng Guofan;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容闳(1828—1912)字纯甫,香山人。七岁时,由容母送入西塾,望将来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十三岁时,随美国传教士普拉温赴美留学。咸丰四年(1854)十九岁的容闳以优异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归国后,容闳在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的提携下,成为驻美副使,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生活活动。在中国近代洋务史、教育史等领域,容闳曾发挥过重要影响力。

此前学界有关容闳之研究,主要关注在其对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贡献方面,然专门针对容闳与曾国藩之关系的研究却鲜有见得,这也就给本文留有了一定的学术探讨空间^[17]。以下,笔者将从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入手,正是由于曾国藩对容闳的“知遇”,才使容闳的“教育计划”得以实现,最终造就了“近代中国留学之父”。

一、容闳的教育救国之志

容闳在耶鲁尚未毕业时,即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

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23]

耶鲁毕业后的容闳,有“彻底归化的资格”,并且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但青年容闳却选择了回到“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的中国。1855年4月,经历151天航程,终于回到中国的容闳,基本已经忘记了中国话。当他依坐在母亲膝下,被问及得此耶鲁大学文凭与学位有什么用,“可博奖金几何”时,容闳的回答,则足以见其年少志高。

“此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为易。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28]

尽管心存报国之志,但因容闳自小出国,并没有获取传统中国的任何科举功名,因此,在面对内忧外患的飘摇局势时,尽管他有着“教育救国”的远大理想,但在其回国的若干年间,却一直是处于报国无门的尴尬境地。

他为谋生曾当过翻译、做过生意,还曾设想投奔太平天国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抱负,此间可谓一路坎坷。直到同治二年(1863)经人推荐,入曾国藩之幕,他才有了建购机器“母厂”、成立兵工学校、实现官派留学等大展宏图的机会与条件。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容闳是有着知遇之恩的。

二、曾国藩对容闳的知遇之恩

同治二年(1863)秋,容闳经人推荐,前往安庆谒见曾国藩。容氏自称:“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272]

在容闳的印象中,“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政治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271]。在容闳的文字中,处处洋溢着他对曾国藩的崇拜。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274]

然而,此容闳第一次见曾国藩。面对曾国藩“锐利之眼光”,仔细之估量,容闳自觉“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此番安庆会谈持续三十分钟,更多的是带有了主幕二人在初识之际的熟络与客套。对于容氏所怀之“教育救国”计划,却是没有涉及的。

大约在容闳入曾国藩大营的两个多星期后,他受到了第二次接见。文正公以“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著手”为问询之,容氏因从友人处听得了一些风声,于是,在“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的前提下,决定顺应曾国藩心意,改变了自己“以教育计划为答”的初衷。

容闳将自己“魂梦难忘”的教育救国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也是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设予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予此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

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且以予今日所处之地为,与总督初无旧交,不过承友人介绍而来,此与予个人营业时,情势略有不同,若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似嫌冒昧。况予对于予之朋友,尤当以恪守忠信为唯一之天职。予胸中既有成竹,故对于此重大问题,不至举止失措。以予先期预备答辞,能恰合总督之意见,欲实行时即可实行也。于是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275]

当面对曾国藩询问时,此时已是幕僚身份的容闳,并未将“教育计划”一股脑全盘托出,反而以“情势略有不同”选择避免“贸然提议”教育计划所带来的可能性“冒昧”。加之,容闳也需要考虑到自己与同是幕僚身份的朋友们之间的“忠信”等问题。

由此可见,由于个人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不断变化,影响其言谈举止的因素也会逐渐变得复杂,但这却又不能被简单地被认为,是容闳变得“阿谀逢迎”或其他。因为出身平民,又无科举功名保身的容闳,在经历了早年生活的跌宕起伏后,他已然深深领悟到自己必须要珍惜好、把握住此时无比靠近权贵的来之不易。

在第二次面见曾国藩后的一个星期,容闳正式得到了建立机器厂的“全权”委任状,并“另有一官札授予以五品军功。”“先往外国探询专门机器工程师,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将来此种机器应往何国采购……”等诸事宜。此机器厂,即后世所称“江南制造局”。

为了建立江南机器制造局,曾国藩从上海道、广东藩司两处,共拨款银六万八千两。同治二年(1863),容闳从上海出发,次年春天,乘船抵达纽约。当时的美国正处南北战争中,国内多数机器厂,皆承造国家急需之要件而无暇顾及外来采购者。但幸得众人帮助,订货单、提货单、机器价值单、保险装运等种种所需之要件,容闳最终得以逐步解决。同治四年(1865)春间,容闳所采办的机器,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281]。

容闳与曾国藩的第三次见面,发生在容氏置办完机器归国后的不久。按《西学东渐记》中所记:

“余往徐州谒文正,……曾督对于予之报告,极为嘉许。予以予购办机器之事,专折请奖。中国官场之常例,专奏之效力极大。以予毫无官职之人,遂得特授五品实官,此亦特例。”^[282]

容闳虽自小就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但从他对于曾国藩的崇拜,主动向社会主流阶层的靠拢,以及迫切寻求清政府官方的认可等行为特征,我们却又不难看出他

内心深处传统而保守的本位情结,以及对于身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追逐。

三、从“小试其锋”到“教育计划”的最终实现

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在就任两江总督前,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当见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时,曾国藩表现出“非常兴趣”。于是,容闳“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见曾国藩“大乐”,容闳“乘此机会”,提出在江南制造局旁边另设一兵工学校的建议。“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235]江南制造局附属兵工学校的建议,因得到曾国藩的“赞许”,“不久遂得实行”。

如果说,之前在曾国藩问及当前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时,容闳因顾及多方因素,权衡之下而无法提及自己“日夕怀思”的教育计划,只是时机与条件不够成熟下的无奈隐忍。那么,此时当曾国藩视察完江南机器制造局后,在得到必要的肯定与赞许之态度后,容闳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向曾国藩提出并请示自己的“教育计划”了。在容氏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此举被其自称为“小试其锋”:

“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遂跃跃欲试。”^[235]

随后,容闳在丁日昌等人的帮助下,将“教育计划”详细说帖,阐述为《条陈四则》,欲转寄北京。尽管此条陈共为四项,但实际上,第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第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等三条,只是“假以为陪衬”。《条陈》真正“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住,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236]

由上,从具体的官派学额、批次,到择选学生的各项标准,以及赴美留学后学生们的膳宿、入学、监管、开销等情节,容闳都已经做了充分的设想与具体论述。此时,容

闳多年的官派留学计划,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可惜好事多磨。当容闳与丁日昌将《条陈四则》敬呈洋务大臣文祥后,文祥先是因丁忧居丧三年,“不得与闻政事”。随后,居丧不过三个月的文祥,“相继为古人矣”。文祥的去世,迫使容闳的“教育计划”,不得不搁浅,“怀之十年,不得一试”。

“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办事必俟机会,机会苟至,中流自在,否则枉费推移。余非不知此,然实际者,要亦人力所造也。”^[238]

但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苍天不负有心人。正当容闳“希望几绝”,感慨自己“目的怀之十年……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之际,突发的“天津教案”,反倒是让他“匪夷所思”地“因祸得福”。

1870年春的天津,人们因“仇教”发生了惨杀法国男女僧侣之暴动。清政府当时派出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人,前往调停。容闳被电招,作为翻译。交涉了结后,容闳向曾国藩重提了搁置三年的“教育计划”。止“一夕”,便得到曾国藩同意。于是,“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容氏“喜而不寐”,不由感慨“十余年梦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239]。

1870年冬,当曾国藩处理完天津教案,回抵南京后,便招容闳前来商讨其“教育计划”具体细节。当时商定的主要有四事: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令容闳组织办事机关,以处理此种留学具体应办事宜。酌设监督2人、汉文教习2人、翻译1人,陈兰彬任监督,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经费出纳,由陈兰彬、容闳二人共主之^[241]。

1872年夏末,第一批中国幼童,共计三十人,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尽管“创大业者”曾国藩,未得亲眼所见其亲创之壮举,在当年3月薨于南京。但容闳对曾国藩于近代中国官派留学计划的实现、第一批学生的出洋深造,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与贡献,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赞誉——“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

“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

西安兴教寺历史与发展研究

许 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杨凌 712100)

摘 要 兴教寺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教寺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至今已经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风雨和兵火的摧残,如今兴教寺已经被列入了“长安—天山廊道世界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兴教寺不仅有着佛教研究的价值,也有着非常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研究和开发兴教寺有利于更多人了解这一佛教圣地。

关键词 兴教寺 历史 现状

中图分类号 K825.8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6-07-07

一、兴教寺的历史

兴教寺全名“大唐护国兴教寺”,是樊川八大寺院之首,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西韦村西北的少陵原畔,是一座始建于唐高宗时期的佛教寺院,也是佛教法相宗的祖庭之一,因为寺内埋葬了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灵骨而成为佛教界的一处圣地。玄奘法师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在译经场所铜川玉华宫,初葬于白鹿原,因为唐高宗与玄奘法师感情深厚,遥望白鹿原而时动悲思。于是在669年迁玄奘法师灵骨于地势较低的少陵原畔,建塔藏之。兴教寺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迁入唐代高僧玄奘灵骨而建塔,唐中宗赞玄奘法师出国学法、弘扬佛道的事迹为“大遍觉”,因而玄奘塔也称“大遍觉塔”,次年(670)因此依塔建寺^[1]。寺名兴教则是唐肃宗题写的,寓意在于大兴佛教,此后兴教寺的名字就流传

下来。在玄奘法师之后,他的两位高徒,圆测和窥基也先后埋葬在兴教寺。其中窥基是唐初名将尉迟敬德之侄,精通佛法,有百部疏主之称。而圆测是新罗王孙,对唯识的经典很有造诣,三座塔呈品字形,至今仍存在于寺内。

关于兴教寺,《游城南记》中有“越姜保,至兴教寺,上玉峰轩,南望龙池废寺”^[2]的记述。张礼是北宋人,这篇游记写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这时候的兴教寺还比较完整,玉峰轩刚刚修建。《长安志》则记载“兴教寺。在县南五十里。总章三年建”^[3],说其位于万年县南五十里,也就是这时候寺庙仍旧存在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十八记载道:“兴教寺在城南六十里,唐总章二年建,内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者为唐三藏元(玄)奘法师瘞身之所,尚书屯田郎中刘珂铭。左为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宏度铭。右则大周园则法师塔,

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2]93}

我们实在无法忽略容闳在字里行间,所抒发的对曾文正公那些溢于言表,且带有膜拜偶像般的赞美与评价。

对此,笔者以为,容氏有此感慨,首先在于曾国藩确实给予他实现多年梦想的机会与平台,对他有提携之恩,没有曾国藩,就必然是没有容闳“教育计划”实施的可能。其次,寒门出身的容闳,内心充满了对曾国藩靠后天努力取得地位与成就的认可与崇敬。“文正将才,殆非由于天生,而为经验所养成者。其初不过翰林,由翰林而位至统帅,此其间不知经历几许阶级,乃克至此。”^{[2]94}

容闳为实现其教育救国梦想的个人奋斗史,事实

上,也正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救亡图存、自强求富梦想的缩影。而曾国藩与容闳,两个成长于完全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环境下的历史人物,在“西学东渐”大时代的浪潮中相遇并合作,由此,所成就的近代中国两次新型事业——第一家新式大型兵工厂的建成、第一批官派少年留学生的出国。而促成这一切的关键,正是在于他们都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危亡意识,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责任与担当,都有一颗真挚而饱含热忱的爱国之心!

参考文献

- [1]徐伟民.中国近代化的滥觞:曾国藩与容闳安庆会晤的历史意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1)
 - [2]容闳著,张叔方译.西学东渐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作者简介:方华玲,南京政治学院军史系讲师。